

中国外交研究 60年: 进步与前瞻*

陈迎春 宋莉涛 张 焰

[内容提要]中国外交研究 60年历程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 30年中国外交研究虽有较大的成就,但实际上处于前学科时期。后 30年间,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氛围越来越宽松,学术事业长足进展,成果数量大增,学术影响力显著增强。展望未来,中国外交研究需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克服各种挑战,以适应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新中国 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学术动态

[作者简介]陈迎春、宋莉涛、张焰,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等。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 60周年。60年间,新中国已经见证了沧海桑田,中国外交研究从一株幼苗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总结、提炼那些充满时代烙印的学术成果,对推进中国外交的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外交研究的非线性发展

中国外交研究 60年来的发展大体上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外交政策和学术土壤,从而对中国外交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研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虽未取得全国政权,但十分重视国际关系与外交的研究。《向导》《群众》《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些党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国际问题以及外交的文章。恽代英的《政治学概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和《政治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及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更具体的外交研究指明了方

向。^①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一批有关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丛书,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时事问题研究会的《抗战的中国丛刊》、《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系列丛书。^②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救亡丛书》,其中,胡愈之的《抗战与外交》和钱俊瑞的《抗日与救亡》都反映了抗战期间外交活动的现实。^③《人民日报》的创刊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这些为以后的新中国外交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关怀下,新中国外交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实现学术再造与新生。周恩来更是明确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④这一时代命题。这意味

* 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外交六十年:历史、利益与战略”的资助,并在写作过程中受教于宫力、李开盛、马小军、门洪华、秦亚青、秦治来、谭秀英、王逸舟、袁正清、赵黎青、周启朋、朱立群等专家。特此致谢。

^① 恽代英:《政治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

^②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田原:《政治学》,上海新时代出版社,1932年。

^③ 张注洪:“中共党史史科学的源流”,《学习时报》,2004年2月23日,第五版。

^④ 胡愈之:《抗战与外交》,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钱俊瑞:《抗日与救亡》,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30页。

着新中国领导人在外交研究起步之初,就意识到了理论应该讲究科学、讲究逻辑。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这一命题未能坚持下去,从而导致中国的外交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徘徊的道路。

为了适应外交实践和学科基础建设的要求,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外交专著与译著。除了介绍中国外交外,关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史的著作作为数较多,凸显了当时“一边倒”背景下中国外交研究的取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中,这一时期外交理论方面的译作共计 9本,这说明当时中国学术界试图通过译著去了解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但是,1956-1966年间,中国外交研究开始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出版成果迅速减少。通过对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检索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仅有 13部有关中国外交的著作,其中研究资料集共有 5部,译著占了 7部,个人专著只有刘志固的《国际关系中的五项原则》。有的科研单位、学者完成了一些内部学术成果,如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陆续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0)、《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9)、《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等,在相关方向的研究中起到了开创性作用。¹

在中国外交研究成果的出版过程中,世界知识出版社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该社出版了 10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63年),每集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协议、重要的照会、外交方面的重要讲话,书后附有新中国外交活动大事记。该文件集至今仍是研究新中国初期外交史的重要资料。

综合说来,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研究由于受时代的影响而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研究宗旨强调政策性而不是学术性。其政策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宣传党和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党和政府政策的需要;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一切研究与分析的权威依据与出发点。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学术性是从属于政策性的,因此,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政治性成为当时学术作品的最重要特征。例如,“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一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提出了一些观

点。²从学术论证过程和后来形势的发展看,文中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但符合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国仍然以美国为首要斗争对象的政治现实,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中国政府的主张。

二是研究方法以梳理、诠释为主。客观地说,这个时期的外交研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世界知识》《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大部分类似于今天常见的深度新闻报道。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也在《世界知识》上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些文章以新闻式的介绍与评述为主,尽管梳理了一些事实,但很少自觉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依据经典的马、恩、列、斯、毛的理论与词句对某个具体事件进行诠释。当时尽管翻译了一些介绍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著作,但大多是为应付批判之需。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研究。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彻底完成了由现存国际体系的边缘者到核心成员的转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摒弃了曾长期奉行的斗争哲学,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新的形势与中国外交新理念对中国的外交研究提出了新挑战与新要求。与此同时,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全面恢复,中国的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外交研究的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有关译著大大增加,周启朋、杨闯编译的《国外外交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外交学译丛”,其中包括国外外交学最新成果,如杰夫·贝里奇等著的《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路易丝·戴蒙德等著的《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等。事实上,这股引进西方理论的浪潮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90年代末颇成声势,至今方兴未艾,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外交研究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引进国外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意识在外交研究中的必要性

¹ 张历历:“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程分析”,载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2005年 4月。

² 郭寄楚:“两大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第 2期。

³ 李小华:《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284页。

与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只有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有效的行为指南,国外的理论只有应用于具体的中国实际才具有指导意义。因此,中国特色意识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最终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外交理论。

在这个时期有关中国与大国关系(主要是中美、中苏和中日关系)的论著中,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有着天然的关切,还对于外交实践的动态有着极其敏感的把握。这些都显露出中国特色意识。但是,这也表明中国学者过多关注当下的问题或是历史经验总结(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历史或思想史著作),而不够关注长线问题和长远问题,例如,无论是官方还是许多学者都一再强调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但没有解析这种机遇期为何是20年而不是30年或者更久、“机遇”与“挑战”的具体体现以及中国的应对战略。

二、当前中国外交研究的重点领域

当前,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学者不但重点关注的既有纯粹的现实问题,又有国外理论的新趋势,并且注意将国外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由此形成了既有理论性、又有现实性的许多研究热点。

关于多边外交。冷战结束后,多边外交日益频繁和活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从而日益受到外交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对于中国的学界和外交决策层来说,全球化时代的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既是一个新的起点,又是一个内外积极互动的过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边外交,既是一种外交谋略和艺术,也是一个学习适应、自我改进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更多地是一种国际体系层次的制度形式,其中包括规范、规则等制度因素的成分。国际制度、国际合作、集体身份和认同、全球治理等问题成为涉及多边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结构性分析、战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是学界研究多边主义的主要方法。¹国内不断可见相关选题的译著,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路易丝·戴蒙德(Louise Diamond)、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gh)的《多轨外交》基尚·拉纳(Kis-

han S. Rana)的《双边外交》等。²

关于军事外交。军事外交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和军界就开始了军事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有的学者着眼于军事外交的产生与发展,界定了军事外交的概念,并详尽论证了军事外交的宏观环境、国际军事交往、国际军事谈判等。³还有的学者总结出新中国60年军事外交转型的几个特点:从以维护中国周边和平环境为核心,转变为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为核心;从保卫国家主权安全,转向保障国家海外利益的拓展;从被动的反应和自我解释,转向主动塑造自身国际形象;从增强抵御战争风险的能力,转向重视危机管理和预防、遏制战争的能力以及实施和平的能力等。⁴

关于经济外交。冷战后,世界大国关系的重心已由过去的政治对立、军事对峙转向以经济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国学者顺应潮流、对经济外交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推出了一批有水准、有影响的著作。有的学者从政府、商业、宗教等不同角度研究外交问题,认为经济外交是将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与经济实践相结合,并将经济外交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系统化地介绍经济外交的概念、原则与实践。⁵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外交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关系到国际经济协调、世界和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应该采用“以点和面相结合的方式,对经济外交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和探讨”。⁶这些学者力图构建一种新的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采用跨学科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对外交实

¹ 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² [美]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印]基尚·拉纳著,罗松涛、邱敬译:《双边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³ 杨松河:《军事外交学概论》,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

⁴ 赵景芳、朱涛:“新中国军事外交60年:历程、特点与经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

⁵ 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⁶ 周永生:《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序论第1、5页。

实践的认识。¹

此外,公众外交、首脑外交、议会外交、地区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明显增多。

在上述基础上,中国学者还对以下一些重大的外交理论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推动了中国外交研究的多元化发展。第一,关于中国外交的文化与哲学。历史文化是中国外交行为的深层次根源,而外交哲学则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准则。这两者在外交实践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它们的系统研究却是近年来才开始的。2003-2009年间,中国外交研究的议题范围十分广泛,就视角来说最为突出的是“寻根性”研究,即以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母本,探讨传统文化与古代外交、当代外交的关系。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了中国外交的非扩张性、选择融入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倾向、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整体性的思维方式、道德本位的权力意识和由此而生的自律性及理想主义风格。²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从古代中国社会一直延伸到了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外交之中。”朱立群也认为,西方主流理论都难以解释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中国外交在目标、身份、行为三方面呈现出一种带有“中庸”特性的整体特点。³第二,关于中国的海外利益与外交制度。为适应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和中国在海外利益的扩展,中国学界对外交制度的研究从无到有,主要集中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和领事保护制度的研究。有学者对涉及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进行了统计分析 with 评估,有的学者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了领事保护制度的新发展,或从国际互动的角度探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如何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如何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外交)能力建设、加强对海外利益的风险管理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建议。⁴此外,关于内政外交、外交与社会、危机管理、地区外交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也已取得一些成果。其中,比较受关注的选题是外交与社会之间关系、外交决策机制、地区外交和公共外交等。

三、中国外交研究的未来课题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外交研究已从“自发”

阶段转向“自觉”阶段,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它还存在一些不足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学术能力与水平与国际同行相比更有相当大的差距。为了弥补不足、推陈出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世界和平的现实需要,未来的中国外交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加强、有所作为。

一是深化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研究。中国学者在建构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方面,初步建构了一些思路与方向。例如,秦亚青认为,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时刻,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构已成为迫切需要;这一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如“和合”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来源,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⁵很多学者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建设。如叶自成、王日华试图采用当代国际政治学通用的话语来阐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以期把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推向一个可供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行对话的平台。⁶阎学通、徐进等人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⁷概而观之,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尚显粗浅。

二是强化中国外交研究的前瞻性与战略性。学者的研究要为国家外交决策、国际战略选择提供科学分析或者操作建议,也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外交实践进行独立评估。⁸近年来,有学者日益认识到

¹ 陈奉林:“一部颇具特色的外交学研究新作——读周永生教授《经济外交》”,《二十一世纪报道》网络版,2006年2月28日,第47期。

² 楚树龙、王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2期。

³ 叶自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

⁴ 朱立群:“中国外交的‘中庸’特色”,《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

⁵ 如夏莉萍:“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状况分析”,《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万霞:“海外公民保护的困境与出路——领事保护在国际法领域的新动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张曙光:“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

⁶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

⁷ 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

⁸ 阎学通、徐进:《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比如,王逸舟教授提出了中国外交要研究的前瞻性课题,包括中国在亚洲地区主义崛起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中国未来解决与邻国主权有争议的各种预案,中国主张的“新不干涉主义”(或者“创造性介入”)的基本内涵;中国对于各种重大国际机制的改造、完善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设中国自己的外交智库和外交评价机制等。^①

三是明确外交研究领域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方向、目标,为学者独立思考营造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外交研究是与国家政治、外交紧密挂钩的学科,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国家利益意识。但是,由于身处不同的位置,学者很可能在何为国家利益、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方面与决策层有不同的主张。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互包容、理解与交流显得尤其重要。同时,外交研究不得不根据决策需要严防走过去的老路——完全遵照决策层的基

(接第 44 页)件,为本国在减排问题上预留政策调整空间,以便进退自如。

其次,日本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调。近年来,日本之所以在谋求国际气候合作主导权方面成效显著,与美国在强制减排问题上的消极立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长期抵制多边减排框架,迄今仍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但是,自奥巴马政府上台执政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开始着手制定新能源战略和强制减排规划,还提出了重归“京都轨道”的可能性,力图重振美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在获悉日本民主党赢得选举之后,美国国务院明确提出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与日本新政府开展密切合作的切入点之一。¹ 对于日本新政府而言,日美同盟关系仍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双边气候合作无疑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政策上与美国过于贴近,将不可避免地压缩本国气候外交的战略空间,并导致日本在国际气候合作中主导地位的弱化。因此,如何在维护日本现有主导权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战略协调,将是下一阶段日本气候外交

调与口径、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成为纯粹的政策诠释与宣传工具。更重要的是,外交研究要弘扬改革开放以后日益旺盛的学术自由风气,继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科学地引进、借鉴西方的理论和办法,强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以利于产出更好、更多、更新的学术成果。其最终目的是增强未来中国外交研究的活力,使学者们能够在科学阐释现实问题的同时,以各种方式为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对外交往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李景治:“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与展望”,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编《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503页。

^① 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的重点。

再次,日本与中国的气候变化合作将会有所突破。日本民主党在竞选获胜前后都明确表示,将把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相对于中日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重大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两国在环保领域有较好的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双边合作可以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全面升温预热。另外,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在日本看来,如果能够通过气候外交途径说服中国松动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将对“后京都”气候谈判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凸显日本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Spokesman Daily Press Briefing Washington DC, August 31, 2009 <http://www.state.gov/r/pa/ps/qlb/2009/aug/128510.htm>.